

中国吸烟成本调查

全国烟民去年“烧掉”2500 亿元

研究者称,如果中国的香烟每盒价格增加 0.4 元,每年可以减少消费 45 亿盒

□本报记者 何鹏

在 2005 年,我国吸烟导致的疾病和直接成本估算为 1665.60 亿元,占到去年 GDP 的 0.91%,吸烟导致的间接成本为 861.11 亿元至 1205.01 亿元,占 GDP 的 0.47%至 0.66%,简而言之,我国烟民去年烧掉了财富 2500 亿左右。这是 11 月 15 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发布的最新《中国吸烟成本估算》研究报告中提到的。

吸烟成本 2500 亿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中心副主任李玲教授表示,吸烟成本包括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两方面,前者主要包括吸烟导致的直接医疗成本。具体的测算方法是,先筛选出吸烟容易导致的 23 种主要疾病,然后分别测算每种疾病的成本再进行最后汇总。

根据李玲的研究,按照全国卫生服务调查统计的 26%的吸烟率计算,2005 年全国吸烟直接成本为 1414.37 亿元,占 GDP 的 0.78%;如果按照全国营养与健康调查的 35.8%的全国总体吸烟率,2005 年全国吸烟的直接成本为 1665.60 亿元,占到当前 GDP 的 0.91%。

事实上,吸烟还导致了大量的间接成本,包括误工损失、被动吸烟、火灾、环境污染以及吸烟导致的人寿命的减少。

经过课题组研究,2005 年二手烟的成本高达 239.91 亿

元至 294.13 亿元,占当前 GDP 的 0.13%到 0.16%;吸烟造成的火灾成本是 8.68 亿元至 10.26 亿元,早亡成本是 606.74 亿元到 894.84 亿元……

汇总各项数据,吸烟总间接成本高达 861.11 亿元至 1205.01 亿元,占到当前 GDP 的 0.47%至 0.66%之间。

建议提高烟草税

为了降低高昂的吸烟成本,有专家建议,提高价格是减少吸烟率的有效措施,而提高价格,首先考虑的就是给烟草加税。

记者了解到,提价的方法在发达国家有过成功的先例。美国辉瑞投资有限公司全球成果研究高级总监弗瑞德·考克斯(Fred Cox)表示,过去 10 年,美国香烟价格提高了 10%,吸烟率降低了 3 到 5 个百分点。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价格提高 10%,可以降低 6 到 10 个百分点的吸烟率,如果对于青少年来说,同样的提价幅度,至少可以下降 7%的吸烟率。”瑞德·考克斯还专门针对中国的情况作了一项计算:如果中国的香烟每盒价格增加 0.4 元,那么每年可以减少消费 45 亿盒。

同时,记者了解到,中国烟草税收确实存在上升空间。目前,我国烟草业总体税负约为 42%,相对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并不算太高。日本烟草税率为 61%,德国为 70%,巴西为 74%,英国为 80%。



美国辉瑞认为,如果中国的香烟每盒价格增加 0.4 元,每年可以减少消费 45 亿盒 资料图

■记者观察

吸烟成本大于烟草全行业税利

□本报记者 阮奇

“吸烟有害健康”,这句印在每个烟盒上的警句早已令人耳熟能详,但是根据记者的研究发现,烟草业作为国家税收支柱的同时,他的社会成本却一直被忽略。

社会成本大于工商税利

烟草业在我国是税收支柱产业之一。根据全国烟草专卖局网站提供的数据,2005 年,烟草全行业的工商税利达 2400 亿。税务系统有关人士告诉记者,工商税利是指税收与利润的总和。

然而,当烟草业作为国家税收支柱的同时,社会成本却一直被忽略着。

按照李玲的研究报告《中国吸烟成本估算》,去年我国吸烟的总成本是 2500 亿左右。事实上,由于某些领域数据的限制,李玲的研究报告并没有涵盖吸烟所产生的间接成本。因此,我国去年全年的吸烟成本,实际上是要远远大于 2500 亿的。

如果 2500 亿的数字得到承认,那么问题就来了,烟草

行业创造的工商税利只有 2400 亿,而它消耗的社会成本却远在 2500 亿以上。

税收较低增加医疗成本

由于烟草消费的健康危害性,各国政府为了限制国内烟草制品的生产,除了征收一般性消费税外,还采取了高额“消费税”。据悉,目前世界上烟草消费税一般都占到烟草税总额 70%以上。

据记者了解,我国的烟草行业税收,通过从量与从价来征收。我国的“从量”标准是 3 元/千支。

2005 年,烟草全行业累计销售卷烟 19328.1 亿支,同

比增加 705.7 亿支。按照从量来计算(3 元/千支),2005 年增加的这 705.7 亿支烟,将会给国家带来新增税收 2117 万。

可实际上,如果按照国际水平的 30 美元水平征税,2005 年我国将以新增消费税 169 亿之多。前者只是后者数额的 1/80。

这 169 亿被从哪些方面抵消了?据记者了解,国际上一些国家通常对烟草征收专门的“健康与吸烟税”,所得税专门用于控烟宣传、对烟民的疾病治疗。也就是说,我国老百姓“补贴”了这些本应由烟草企业付出的费用。

各国烟草征收方式及税率水平

国家	消费税征收方式	从量消费税率
中国	从量与从价混合	3元(约 0.36 美元)/千支
美国	从量	约 34 美元/千支
日本	从量	7072日元(约 54.1 美元)/千支
德国	从量与从价混合	约 52.4 美元/千支
俄罗斯	从量	29卢布(约 1.3 美元)/千支
英国	从量与从价混合	90.43 英镑(约 150.7 美元)/千支
荷兰	从量与从价混合	约 52.3 美元/千支
印度	从量	1260卢比(约 30.7 美元)/千支

资料来源:世界卷烟税收政策浅析

在 4000 公顷荒地上造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可换回 220 万美元

全球首个林业碳汇项目落户广西

□本报记者 阮晓琴

相关贸易额已达 35 亿美元

在中国广西的荒地上造林,所吸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被西班牙和意大利两国用美元购买。记者昨日从世界银行负责林业碳交易项目一位负责人处了解到,中国和世界银行在广西合作开发的一个林业碳汇项目最近成功注册为全球第一个此类项目。

此前项目集中能源领域

据中国国家林业局造林司碳汇管理办公室副主任王春峰介绍,广西该项目通过在环江县和苍梧县的 4000 公顷荒地上造林,可在 15 年里吸收 50 万吨二氧化碳。在世行的安排下,这一吸收量将被西班牙和意大利用来履行其根据《京都议定书》承诺的温室气体减排量,为此中方可得到 220 万美元的资金。

根据《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清洁发展机制,发达国家出资在发展中国家实施造林和再造林项目,这些项目产生的实质性温室气体减排量可以用来实现发达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中承诺的减排目标,这样的项目叫造林和再造林碳汇项目。

世行的碳融资办公室目前管理着由 13 个政府和 73 个私营公司建立的总值 19 亿美元的九个碳基金,包括社区发展碳基金和生物碳基金。在广西项目之前,世行在能源方面已经“捕捉了”多个碳交易项目。

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是《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关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合作机制。在气候变暖的威胁下,2005 年开始生效的《京都议定书》提出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相关技术,以支持具有温室气体减排效应的项目,并购买由此产生的减排额度。

2008 年至 2012 年是《京都议定书》的第一个承诺期。在这个期限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却可以向发达国家提供温室气体减排量,从中获得资金和先进技术,促进可持续发展。

碳交易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境外融资的新方式。南钢股份前不久与世界银行签署了温室气体减排购买协议,仅出售气体排放量一块,公司就增收近 3300 万元。

上述世行项目负责人称,中国碳交易项目近两年才启动,但已经发展得很好。到目前为止,亚洲国家占了清洁发展机制市场总额的 94%。中国则在亚洲的份额中占比 60%。

国家发改委国家气候变化对策协调小组办公室主任高广生透露,目前,我国已拥有 125 个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涉及到碳减排量六亿多吨,贸易金额达 35 亿美元。

北京提出构建环渤海旅游圈

□本报记者 王文清

“十一五”期间,北京将建立都市核心旅游区、郊区旅游圈和环首都旅游圈的“一区两圈”旅游发展格局,并尝试旅游业跨区域合作。这是记者从最新公布的北京“十一五”旅游及会展业发展规划中了解到的。

按照规划,在未来五年,按照资源共享、市场共拓、客源对流的要求,北京市将加强区域协调与互动,以“一核(北京)、两环(水陆两条环线)、三中心(天津、大连、烟台)”的发展格局,构建以北京为核心的环渤海旅游圈。

周边地区的河北、天津和山西等省市,将成为北京旅游发展的主要扩展区域。重点发展以北京为核心,以京张、京承、京沈、京石、京开高速公路和京原国道为旅游交通走廊,通过区域协作,实现资源共享和市场互育,形成北部自然生态旅游、东南部海滨休闲度假、西南部历史文化观光、西部自然与文化观光四大特色鲜明的区域旅游板块和多条特色旅游线路。

据统计,“十五”期间北京市旅游外汇收入累计 147.3 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 4936 亿元人民币,旅游业平均每年为北京创造了 1222 亿元的收入。

“红心蛋”拷问职能部门执政能力

□吕青

“红心蛋”事件在被媒体曝光后,有关部门立即展开行动。

11月14日,国家质检总局紧急布置全国开展鸭蛋、鸡蛋等禽蛋制品中苏丹红的专项检查。同日,河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通知,要求全省全面彻底清除市场上的有害“红心”鸭蛋。11月15日,卫生部办公厅发出关于查处“红心鸭蛋”的紧急通知,对发现的违法行为及时采取卫生行政控制并依法查处。11月16日,“红心鸭蛋”主要产地之一的石家庄市平山县将查获的 5100 只“涉红”鸭子进行扑杀、深埋,对“涉红”鸭蛋和饲料也做妥善处理。

不难看出,在“红心蛋”被曝光后,几乎所有的职能部门都出动了,然而,这种状况依然令公众疑虑重重。假若不是媒体曝光,“红心蛋”会有人发现吗?会有人及时清查吗?这一点,正是最令公众所担心的。从以往无数的食品安全事件来看,始终没能走出一个循环:媒体曝光——有关部门行动——检查、停售、处罚——媒体再曝光——有关部门再行动,有关部门为什么总是走在媒体后面,或者说,为什么总是问题总被媒体率先揭露出来的呢?

与职能部门相比,媒体缺少必要的专业知识,缺少专业的检测设备,他们只能根据追踪、调查食品的源头来发现问题,尽管如

此,他们依然能够将大量问题揭露出来,引起社会的关注,使人们有免遭有毒食品的进一步伤害。而有关部门拥有现代化的检测仪器,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有专门的调查经费,为什么在发现问题食品方面,还不如非专业的媒体?是专业知识不够,还是敬业精神不足?

目前的食品管理机制一直因效率低下,漏洞百出而遭到质疑。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几位全国人大代表掰着手指头,数出了食品安全管理的近 10 个“婆婆”:农业、质监、卫生、工商、商业、药监、城管,出入境检验检疫……但是,10 个婆婆却管不好一顿饭。一些部门执法的目的不是为了食品安

全,而是为了罚款,为了创收。这正如一位全国人大代表所说:“有收费的项目,大家争着去做,安全问题出事了,谁都推卸责任。”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只要相关负责人交了罚款,问题食品可以继续销售,似乎一切都万事大吉,食品管理机制形同虚设。

另外一个问题是有关部门互相协调与配合不够。在“红心蛋”等事件发生后,各个职能部门乃至相关地方政府悉数出击,清查、追源、检测、停售、扑杀……效率之高,配合之紧密,令人目不暇给,问题食品迅速被清出市场,倘若平常有关部门都如此负责和配合,还会有那么多的问题食品层出不穷地发生吗?

我国在食品管理机制上,是分段、分行业设计的,比如,质监部门负责生产环节,工商部门负责流通环节,这种设计的初衷是为了做到明确职能,各司其责,然而,一种食品一旦被发现,到底问责谁?每个部门都可以找到理由推卸责任。因而,现在食品安全的最大问题是,有了好处,每个部门似乎都能沾上边,出了责任,谁都推得一干二净。这使得个别部门为出发点,而将公众的利益放在次要位置。

通过“红心蛋”事件,我们应该认真反省,如何从制度层面来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以走出有毒食品肆虐的困局。

□叶檀

11月15日,因为大力抑制房价政策收效不大,韩国副总理权五奎代表韩国政府“向无住房平民表示歉意”,建设交通部长官权秉直、青瓦台宣传首席秘书李百万和青瓦台经济辅佐官文济向总统卢武铉递交辞呈,这是问责制的体现。青瓦台发言人尹大福宣布,虽然此次由他们主动请辞,但实际上却是因政策失败问责性辞职。

韩国此轮房价飞涨起自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当时韩国房价下跌近一半。为扶植建筑业,1997 年韩国政府放宽了公寓转让限制,此举虽然成功搞活了韩国房地产市场,

韩国房价是我们的镜子

却助长了房地产投机,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韩国国税厅对首尔等 9 个房价暴涨地区的调查显示,2000 年 1 月至 2005 年 6 月的 5 年半时间里,上述地区公寓的平均售价上涨了 2.8 倍,而同期韩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仅增长 4%—5%。

韩国房价暴涨有方面的因素。首先,政府对本地市场认知有误。韩国人与中国人一样热衷于购买不动产。最近一项问卷调查显示,90%的受访韩国人表示,如果有剩余资金他们愿意投资房地产。而这样的心理是抬升房价最重要条件。

其次,人口过分集中,韩国房价最高区域在集中了韩国人口近一半的首都首尔。目前,在首尔部

分地带,房价上涨率最多达到通货膨胀率的 7 倍。

另一方面,大量投资不动产也显示出韩国国内货币流动性过剩,人们对于货币的信心不足,更愿意转换成投资品种以保值增值。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韩国的富裕人群成为房地产投机的急先锋。韩国政府提出,高房价是强大的“房地产势力”——部分建设企业、金融机构、房地产中介和房地产品媒体故意哄抬的结果。投资的最大特点是羊群心态,广大工薪族纷纷跟进,房价自然水涨船高。

韩国政府对高房价的这些原因,一是政府出面安抚民心,韩国总统府表示,将制定“如宪法般

以更改的房地产制度”,以维护多数人的利益;二是从税收与贷款政策等各方面抑制房地产市场

的膨胀。韩国政府对全国 5 万—10 万名拥有大量房地产的富裕阶层征收“综合房地产税”,从 2005 年开始,出售第二套以上房产的卖家需交纳 30% 的资本收益税,2007 年起这一税率将提高到 60%。为抑制投机,金融机构住房贷款额度不能超过实际市场房价的 40%,而对面向普通市民的住宅金融公社的长期抵押贷款利率,则下调 0.15%。第三,加快公共住宅住宅建设,解决普通居民无力购房的燃眉之急。接下来的四年,全国新房供应量共达到 164 万套。最后,为缓解首都

住房困难,分流人口,计划加快新建卫星城。

韩国政府正在解决我们同样的房价难题,在各项配套政策中引人关注的是韩国政府在贷款利率等方面推出的救援普通群体的计划,以及对增加住房供应量的具体承诺,这是政府无法卸责,也正是我们的调控政策所缺乏的。令人遗憾的是,韩国政府推出的新方案并没有针对货币过度流动性的举措,使得房地产市场调控前景仍不明朗。

原首尔市长李明博强烈批评韩国政府的不动产政策“如同不精明的猎人,为打一只野猪满山瞎跑,结果祸害了山里其他动物。”希望我们不要重蹈韩国的覆辙。

应对食品危机谨防走极端

□冯玉国

从事前的无人查问,到事后的草木皆兵,“红心蛋”事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据昨天的《信息时报》报道,11月15日,广州市工商局发出禁令,从即日起,全市禁止向消费者出售鸭蛋。不管是红心鸭蛋还是黄心鸭蛋,不管是在批发零售市场还是餐饮市场,一律禁止销售。但 16 日,广州市工商局消保处表示,目前暂时停售范围仍仅限于红心鸭蛋,并没波及黄心鸭蛋。

既然未波及黄心鸭蛋,记者调查时为何发现广州市内多家超市,无论红心鸭蛋或是咸鸭蛋都不再有卖呢?放下这个疑问不提,假若有关部门真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以走出有毒食品肆虐的困局。

人们之所以会本能地放大“红心蛋”的危害,根源在于对于有关部门的不信任。如果有关部门事先认真负责,及时发现,影响面积不至于这么大。事实上,在“红心蛋”事件中,那些养殖户也是受害者,一些不良商人以高价诱使他们给鸭子喂“红药”,这些养殖户自己也经常吃“红心蛋”,如果当地有关部门及时发现问题,讲明“红药”危害,对不良商人进行处罚,不仅危机事件可以避免,当地辛辛苦苦树立起来的鸭蛋品牌也可以保全。

一次食品危机毁掉一个品牌乃至一个行业的悲剧一再重演,充分暴露出有关部门在应对、处理危机事件时的急功近利,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反思。